

综述

近年国内苏联史研究状况综述

白晓红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2-0088-0009

苏联国家七十余年的风雨历程是艰难的、不平凡的，苏联历史的研究也同样经历着曲折的过程。俄罗斯国家的历史科学同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苏维埃时期，历史研究从属于政治，具有严重的政治化和教条主义倾向。解体前后、大转折时期，史学与国家一起体验着转轨的阵痛。苏联解体二十余年后，俄罗斯史学界开始痛定思痛，努力克服苏联时期的教条主义和改革初期的浮躁情绪，尝试进行真正科学意义的历史研究。

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对象国研究状况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苏联史学者，继承我国历史编纂学的优秀传统，力图超越俄罗斯国家苏联史研究中的政治色彩^①，在吸收俄罗斯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苏联历史档案文献、苏共中央文件、原始史料和网络资料，努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对苏联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一、大部头专著、通史类研究出现

近年来中国苏联史研究的最丰收获是，经过数年的积累、沉淀，苏联历史的通史类研究和有分量的专著出现。

2010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共分上中下三册，150多万字。书稿甫一面世，就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该书的作者群集合起国内苏联史学界大部分优秀的研究者，以“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苏联历史问题。此著作的内容几乎涵盖苏维埃国家74年历史过程中所有重要的问题。

姚海以大量的原始档案和史料为依据，阐述了1917年俄国革命俄国的基本状况、二月革命的历史真相以及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的过程，分析了以往十月革命研究中许多存疑的问题。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立宪会议未能在俄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作用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由于处于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泛滥，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在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下层群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摆脱困

^① 以苏联时期为对象的史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成为诠释政权（苏联时期是为苏维埃政权歌功颂德；解体后是极力揭露苏维埃政权的阴暗面，以证明新政权的合理合法性）的最好工具。

【作者简介】白晓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境的一个选择。”

郑异凡在“在什么是军事共产主义，其后果如何”、“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两篇中，以《列宁全集》和档案材料为基础，对于苏联建国初期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发生、发展、斗争有深刻的论述：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是苏联的第一种模式，它被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所取代，这是苏联实行的第二种模式，也是较好的模式。可惜的是，20年代末斯大林摒弃了新经济政策模式，开始实行他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就是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同时，对于布哈林及其理论、托洛茨基的评价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等问题，郑老师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做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研究。

对于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马龙闪在书中有较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大清洗”运动的定义极具科学意义：“‘大清洗’运动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以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其斗争对象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持续时间达4—5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另外，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问题、战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问题，马龙闪先生基于原始史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对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问题、赫鲁晓夫的“解冻”问题，杨存堂的研究予以了深入探讨，涉及《秘密报告》的准备和出台过程、《秘密报告》的内容以及对报告的评价。

徐葵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从勃列日涅夫的生平其人到他执政18年的三个阶段。叶书宗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扼杀“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进行了研究。陆南泉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

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加以了探究。事实上，书中对于苏联各个时期的经济问题陆南泉都有涉猎，特别是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的第三册几乎都是用于苏联剧变原因和教训问题之探讨的。

戈尔巴乔夫时期是左凤荣研究方向的一个重点。书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论述大多数源自于她的笔下：“戈尔巴乔夫的升迁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变化”，“‘8·19’事变的前因后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的作用”等。

2012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立菲等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一书，全书共60余万字。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社会历史的专题著作。

作者运用大量苏联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对1921年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以后，苏联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日常生活的变化予以探讨。全书描绘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全貌，指出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的积极发展与成绩，同时揭示了“开右灯，往左走”的时代矛盾。对该时期“市场经济改革被抛弃的原因”这一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解读：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根本突破，由于苏维埃国家未能在政治、社会等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进行明确系统的理论创新，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全方位的改革，导致市场经济改革孤军前进，半途而废。

该书在展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基本风貌的同时，从社会层面探究了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最后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第二，缺乏系统的理论创新和全方位的改革，不仅是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根本原因，也是列宁新经济政策客观上蕴含的第二项重要思想遗产，这项遗产长期以来被惯性思维所忽视和淹没。

左凤荣、沈志华所著的《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下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1月出版。该书从沙俄时期写到2011年初,重点论述了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以及俄罗斯向新型现代化的转型过程。该书的中心思想是:俄罗斯的现代化是追赶型的、国家起着主要作用的、以增强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片面的现代化。

俄国在彼得时代从一个偏安于东欧一隅的不为人知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大国,开始与欧洲列强争夺,成了影响欧洲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影响,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主宰着半个世界的命运。但是,俄罗斯的发展、崛起、现代化进程是不可持续的,表现为大起大落,甚至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俄国在克里木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到惨败,发展遭受严重阻碍。斯大林曾骄傲地宣布苏联用十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用五十年、一百年走过的路,但是,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再次沦为二流国家,俄罗斯似乎又退回到了历史的起点。2000年以来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开始复兴,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又给俄罗斯带来重创,梅德韦杰夫重启了现代化进程,要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崛起与现代化进程能给人以许多启迪、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的话,俄罗斯给我们提供的更多是教训。

陆南泉著《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是国内近年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本重要的专著。

书中主要研究的是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作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一开始就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的条件下进行,加上政治体制的倒退(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这样就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停滞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和停滞;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难以改变;粗放型的投资成为导致经济效率低和浪费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作者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停滞和积累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二是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该书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历史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义,这个时期在稳定这个表象的掩盖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国家发展走向停滞,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各种潜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对苏联走向衰亡有着重大影响。

解国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党研究(1901—1925)》一书,是我国系统研究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首部专著。该书在对国内外特别是俄罗斯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了俄国社会革命党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作者根据现代化社会转型理论对该党的性质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不能把该党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它是继续膜拜西方的民粹派政党,是民粹主义的最高阶段。

作者具体分析了俄国社会党的纲领,并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农民在保持传统宗法意识的条件下通过民主机制走向现代社会,并不能解决宗法集体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冲突。对农民来说,这只是一种安慰,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作者把俄国社会党先激进后妥协的策略归结为这种冲突的反映。恐怖的激进策略建立在否定政治秩序的基础上,忽视了宪政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妥协策略把希望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忽视了政治制度与国民素质之间的关系;寻找第三条道路是对现实的回避,阻止了革命的深入。

最后,作者对于俄国社会党的思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总结,认为该党虽然在政治自由、土地社会化等方面与旧民粹派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改进,但仍然是民粹意识的继续。

张建华著《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俄国史读本》,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的特色在于每章后面有“本章小结”、“思考题”和“建议主要阅读文献”。特别适合于大学历史专业教学,当然也适用于俄国史或世界史爱好者的自修。

二、基于档案文献和原始史料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陆续公开苏联时期的档案文件,1993年之后开始大量公开、解密、整理和

出版。迄今有400余种原始资料(文件、档案)集出版。其中重要的有:45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集》和《中苏关系档案》、《苏联历史文件》系列^①、俄罗斯历史学会整理的1937年和1939年苏联居民大通信的资料^②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的损失和苏军部队牺牲情况的统计资料^③等等。除结集出版外,历史档案方面的杂志(《历史问题》、《历史档案》、《俄罗斯历史》、《近现代史》、《自由思想》、《史料》、《俄罗斯历史档案》)也刊登各类历史事件的档案文件。

徐元宫近3万字的论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若干问题考证》(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1期)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及若干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历史考证,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

赫鲁晓夫并不是“揭开内幕”的唯一倡导者,米高扬等人也曾积极倡导“揭开内幕”。做秘密报告,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做出的决定,并且这一决定得到了苏共中央全会的同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集体的决定,并非赫鲁晓夫个人的决定。同时,“秘密报告”也并非出自赫鲁晓夫一人之手,而是苏共中央领导人合力之作,事先经过了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修改。做“秘密报告”也不是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一次有计划的组织行为。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具体时间,是在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并非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当今俄罗斯社会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持肯定态度。

另外,徐元宫根据解密档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揭示苏联历史问题:《20世纪初期苏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中央机构名称考辨》(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解密档案披露苏联原子弹制造重重内幕(上、下)》(载《读报参考》2012年9月下、10月上)、《解密档案:收听“敌台”的前苏联社会》(载《信睿》,2012年第7期)、《苏联时期的农民暴动》(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载《凤凰周刊》2011年第23期)、《苏联时期大饥荒》(载《凤凰周刊》2009年第23期)、《克格勃五局与苏联社会的思

想钳制》(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等等。

郑异凡论文《1922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审判案》(载《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1期)是运用档案资料揭示历史的一个出色的研究。1922年的“社会革命党人案”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大政治案件。但是很难说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实际上这场审判是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对抗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是要给这半世纪的争论画上句号。布尔什维克党打算通过社会革命党审判案实现一箭双雕:一方面从政治舞台上排除尚存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其次是败坏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消除他们在群众中特别是农民中的影响,埋葬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另一种社会主义道路和方法。

郑异凡以审判案的原始文件^④为基础,描摹出1922年右派社会革命党案件的全貌。文章首先介绍了社会革命党的概况。多年来关于苏联官方对社会革命党灭亡的原因被解释为其“思想上破产”,其普通党员对其纲领和实践的失望。事实并非如此,社会革命党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打压下被消灭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社会革命党人不仅要求经济民主化,而且要求政治民主化,这对广大群众产生极大吸引力。文章接着论述了审判的准备、法理上的问题、与1919年大赦令的相悖、被告都是历经磨难的革命者等问题。最后是审判本身和国际舆论及党内不同声音。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一大革命政党,进行过反对沙皇制度的英勇斗争。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为消除社会革命党在俄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中的影响,1922年举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社会革命党人则利用法庭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毫不改悔。审判在国际上引发强烈抗议,虽然判处了一些被告死刑,但最终没有执行。

① 例如:1. Сталин: Политбюро. 1930. М., 1995. 2. Большевик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ереписка. 1921-1927. М., 1996. 3. Письма во власть. М., 1998.

②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М., 1991./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9 г.: Основные итоги. М., 1992.

③ Гриф секретности снят. Потер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и во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М., 1993.

④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социалистам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ми (июнь-август 1922).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Сост. С.А.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К.Н.Морозов, И.В.Чубыкин. -М.: РОССПЭН, 2002.

郑异凡的另一篇论文《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载《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2期)也是老一辈史学工作者运用原始资料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曾颁布“出版法令”,答应政权一旦稳定,就确立出版的完全自由。后内战爆发,为军事需要实施军事书报检查。内战结束后,这一临时措施被常态化,建立了专门的书报检查机关——国家出版社、图书出版事业总局,实施对书报的严格检查,以官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衡量各种出版物和媒体,把唯心主义、宗教等等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著作统统列入查禁范围。俄共(联共)是书报检查的最高法官,书报检查制度也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反对派的文章言论也成为查禁对象。

李淑华的论文《列宁时期书刊检查措施及其评价》(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也对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予以关注。认为从客观上讲,列宁时期实施的书刊检查是恶劣与残酷的环境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也有偏颇之处,并且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将这一检查强化、扩大化,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一定损失。

1953年苏联“贝利亚事件”曾轰动一时。不过,贝利亚到底是如何死亡的,至今仍是个谜。郑异凡论文《剪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动的一场政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1期)指出,贝利亚并非经审判合法地被枪决的,而是6月26日在其住所被枪杀的。

文章运用大量的史料得出结论:为除去贝利亚,赫鲁晓夫在领导成员之间挑拨离间,离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策动其他主席团委员密谋反贝利亚,动用国防军将领及军队的力量,甚至出动坦克,搞突然袭击,不经法律程序除掉了党政第二号人物,然后又编造种种谎言,掩盖其无法无天的做法。这是斯大林镇压的继续,手段极其残酷,是一场由赫鲁晓夫策动的有预谋的政变。赫鲁晓夫以后实施的改革与贝利亚的“百日新政”并无原则区别,说明这不是政策路线的分歧,而是一场争权斗争,它为赫鲁晓夫的飞黄腾达扫除了最大障碍。

对于贝利亚事件的研究还有王桂香的论文《“贝利亚事件”的历史考察》(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1年第1期),该文也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

1953年6月,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的贝利亚,突然被秘密逮捕,随后被苏联当局指控“反党、反国家罪行”并被枪毙。对“贝利亚事件”的这种“正统说法”沿用了近半个世纪,“贝利亚事件”的真实面目鲜为人知。据新解密的历史档案材料披露,实际上,当年的那些指控是凭空捏造的,“贝利亚事件”存在罪名不符的问题,它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是苏联集权政治的产物。该文详细阐述了“贝利亚事件”始末并深入分析了原因。

该文有相当篇幅是对贝利亚国务活动的全面关注:既有其参与镇压的历史事件,也包括其负责领导苏联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对苏联国防工业发展的贡献,同时也正面地阐述了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的一系列旨在纠正错误的大胆举措——拟定大赦草案、率先发起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等等。

张盛发长篇小说《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写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50周年之际》(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6期),运用新解密的档案文献,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阐述了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及其决策。

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苏联核导弹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两种动机:捍卫革命的古巴并使其成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榜样;缩小同美国在战略导弹方面的差距。维护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考虑、苏联同美国在欧洲的争夺也对赫鲁晓夫的最后决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世界革命的理念则是赫鲁晓夫一切外交行动及其动机的基础和根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是没有根据和脱离现实的主观主义的产物。

张盛发的另一长篇小说《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缘起与发展:2003年至今》(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也是以丰富的俄文原始资料见长,历史教科书问题大量涉及苏联历史问题。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俄罗斯社会对自己的历史首先是苏联历史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歧见。第二个原因,与第一

个原因密切相关，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和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俄罗斯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仍在争论，特别是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规范历史教科书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第三个原因，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争执。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让俄罗斯人争论不休和莫衷一是。

以档案材料为依据的研究还有刘显忠的论文《苏联联邦制的问题与缺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文章论述了苏联的成立及苏联联邦制的问题：联盟方案保证的只是几个联邦主体地位上的平等，而不是各民族的平等；俄罗斯在苏联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按民族特征建立的民族联邦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兼具单一制和邦联制特点的联邦制度带来的问题，都不利于联邦制国家的巩固。苏联虽然保证了几个独立共和国在苏联的平等地位，赢得了几个独立共和国的信任，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缺陷。正是这些问题和缺陷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白晓红论文《早期苏维埃文化的基本特征》（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4期），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提炼出早期苏联文化发展的特征。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文化奠定了整个苏联时期文化发展的基础。十月革命后，新型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为无产阶级服务，消灭文化的不平等，开展劳动教育，强调意识形态在艺术创作中的影响。斯大林时期苏联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在各种创作形式中树立文化样板，艺术创作的党和阶级的观点，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操纵，文化创作中盲目乐观主义和个人崇拜盛行，艺术性符合群众标准，创作活动服从于“社会订货”等等。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艺术创作的唯一标准。

发生在1921年初的喀琅施塔得兵变，是促使苏俄领导人改弦更张、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苏联时期的史学研究中，一直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国内外敌人策划的反革命事件。新的档案资料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左凤荣论文《喀琅施塔得事件真相》（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据此论证了喀琅施塔得事件爆发的原因、苏俄政府的政策以及事件的影响。

张丹论文《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探讨了苏联早期的城市住房体制。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集中化的住房管理政策，试图迅速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一举解决住房危机。然而在实践中，因为国家无法独自挑起解决住房危机的重担以及住房管理的责权关系不明确等原因，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既无法有效管理住房，也不能整治战争对住房事业造成的创伤和解决住房危机。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继续解决住房短缺问题，苏维埃政府调整了住房管理政策，住房管理体制由国家集中管理向国家、集体和个人分散管理转型。分散化住房管理方式取得了积极成效，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

在2012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年会上，两篇关于冷战时期苏联的犹太政策的论文，资料翔实丰富，令人印象深刻。一篇是宋永成的《冷战时期苏联反犹政策举隅——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为中心》，文章运用新解密的原始档案材料，解析冷战时期苏联反犹政策的典型案例。在美苏冷战达到第一次高潮之际，苏联当局精心策划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消灭苏联社会的犹太精英，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被视为第五纵队的整个苏联犹太民族。这一案件充分暴露了反犹主义传统在苏联社会的影响之深，成为苏联犹太人后来大量移民国外的重要原因。

肖瑜的《冷战与苏联犹太民族政策的变化》一文也是讨论斯大林的犹太民族政策的。二战后，苏联的犹太政策相当复杂。斯大林一方面积极支持以色列建国，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并扩展到东欧。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赶出工作岗位，有些甚至丢了性命。作者认为：斯大林支持以色列建国是基于其外交政策的需要，而非对犹太人的同情。这一政策在外交上是成功的，但也唤醒了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许多苏联犹太人甚至一些老犹太布尔什维克也开始表达对新生以色列的好感。随着冷战爆发和以色列从1948年下

半年开始出现倒向西方的苗头，斯大林更加不信任苏联犹太人。冷战时代强化内部管理、整肃纪律是必然的，于是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国家反犹太主义运动。

三、经典的重读

列宁著作对于苏联史研究来说，不仅仅是经典著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更具有史料价值。随着新资料的出现、研究的深入以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我国学者对于列宁许多经典作品有了新的认识，这构成了近年苏联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一）列宁晚年思想的转变

在郑异凡老师近年的研究中，依据列宁著作，对列宁晚年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多方面的探索。

1.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中，郑异凡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列宁和共产党执政前的探索：从马恩著作中学习，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市场经济。关于国家问题，列宁与布哈林展开讨论。列宁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写成《国家与革命》，强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后初期，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实现粮食征收制、银行和工业国有化、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高度集中的军事命令制。

1921年3月开始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时期，列宁改变了对农民的估计，引入市场、商品、货币，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作重心应当转向经济文化建设。遗憾的是，列宁的继任者没有理解或者是不想执行列宁转变了的思想，继续阶级斗争、党内斗争。

在《农民的“布列斯特”——列宁是怎样对农民妥协让步的》（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4

期）一文中，郑异凡详细研究列宁晚年的著作，进一步论述了列宁晚年对农民认识的转变、苏维埃国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做出过两次大的妥协，一次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强大的德国军队的压力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订屈辱的割地赔款和约，否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丧失的危险。第二次大的妥协是对造反农民的让步，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次让步被称作“农民的布列斯特”。

2. 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思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政党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格纪律的组织。在建党的原则上，列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但列宁的这一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在夺取政权时期，列宁强调民主集中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列宁更强调实行民主制。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注意发扬列宁的民主制思想，而更多地继承了夺权时期的集中制思想。

戴隆斌的论文《一篇发人深省的好文章——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党建研究》2012年第1期），阐述了列宁该篇著作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于1920年4—5月间。当时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欧许多国家出现了革命高涨现象，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成熟的政党，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美国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左”的思想非常严重并且日益泛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构成了严重危险。这些“左”倾思想的共同特征是：反对议会斗争，拒绝参加工会组织，主张“打倒领袖”、“取消政党”，否认党的纪律，认为领袖与群众、阶级与政党是相互对立的。他们往往不顾所在国家的客观实际情况，主张采取冒险行动，立即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列宁写了这篇著作逐一进行了驳斥和解释，并把它分发给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基本上采纳了列宁在著作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既要反对右，更要反对“左”，“左”的思想倾向更加

危险。必须正确理解政党、领袖、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根据客观实际不断调整革命策略。

（二）关于《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

高晓惠论文《关于〈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兼论斯大林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以踏实的研究对《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的出版背景、它对前两版的否定以及它的政治化倾向予以全面的探讨。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具有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烙印。其出版的目的是要纠正第二、三版中的“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所谓“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首先是指前两版的编者、注释中有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斯大林时期被清洗的人的名字。斯大林本人直接干预第四版的具体收文。例如，斯大林反对把《哲学笔记》收入第四版，认为不必“把列宁的遗产抻得太长”。整版选材上也带有斯大林主观目的性。对于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文献和涉及对外交往、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文献等，被很有限地选入。即使收载，也有大量删节。列宁有关“租让”方面的文献即遭大量删节，仅1920年11月—1921年3月的文献就删节了近20处。同时，第四版打破常规的编排体例，修改列宁文章的标题，利用参考资料的编选贯彻编者的意图，在文章的取舍上尽量不载有关列宁肯定或赞扬的、当今却是“人民的敌人”内容的文献。

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以出“勘误表”的方式对第四版各卷的注释进行政治性的订正。1957年1月，苏共中央通过了编印《列宁全集》第五版的决定。

四、对苏联解体的新认识

正如俄罗斯学者冈察洛夫所言：斯大林模式的终结，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我国，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探究，不仅是史学工作者、国际政治学者，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广大公众永远感兴趣的题目。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苏联解体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2011年，苏联解体20年之际，国内各刊物纷纷开辟专栏探讨苏联解体问题。

左凤荣论文《苏联解体20年：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究》（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2期）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角度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享有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物质财富，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国家权力机关，防止其变成压迫民众的工具，苏联的体制却与此背道而驰，因此，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其体制背离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背离了民众的需要。如果苏共策略选择得当，本可以对此进行改革，使之更符合民众的需要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犯了一系列错误，不但没有把社会主义改好，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另外，左凤荣在《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错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1期）一文中，从苏联末期政治改革失误的角度探讨苏联解体问题。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苏联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解决公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但是，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戈尔巴乔夫不切实际地试图恢复列宁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想通过全民选举苏维埃代表来实现公民与政权的结合，实践的结果证明在现代条件下这么做行不通。这一选举导致了苏联的政治过热和混乱，更使苏共威信丧失，难以控制局面，最后不得不实行总统制。匆忙推行的总统制仍难以挽回局面，反而促进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最后使苏联这个大厦倾倒，苏共失去了政权。

在与杨金华商榷的论文《苏联剧变是信仰危机还是体制危机》（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左凤荣认为，苏联剧变源于体制危机，而非信仰危机。

苏联剧变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大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苏共的社会主义实践出了问题，经过70多年的探索，苏共并没有找到适合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展成改向，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放弃了社会

主义道路。这一教训值得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但把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为信仰虚无主义危机，显然是本末倒置。苏联剧变不是信仰虚无主义的问题，是放弃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其他选择的问题。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公开性、民主化，而在于原有的信仰空洞无物，未给民众带来实惠。

邢广程论文《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嬗变》（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从政治信仰这个角度来观察苏共瓦解问题和苏联解体问题。作者认定，政治信仰问题是政治意识中的核心部分。文章在讨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政治信仰、世界观和对马列主义的看法等问题时，既关注到他们当政时期的言行，也没有忽视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所撰写的演说和回忆录等等。因为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已经无所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表露他们当政时期不能说出的真实意图和思想。深入、客观和全面地剖析戈尔巴乔夫等人政治信仰变化的实质和轨迹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

俞邃的论文《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1期）从解析那一时期苏共中央标志性会议入手，探讨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问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出现的，首先必须从他那里找原因。探究苏联模式弊端的严重影响，是吸取教训不可缺少的内容。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有过良好开端，由于遇到执行上的困难加之指导思想变异和政策失误，未能沿着既定方向走下去。“新政治思维”有其局部合理性，要害是把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建立在对立统一世界的同一性基础上。多党制是苏联改革一再受挫和政策不断失误情况下的产物。苏联共产党是联盟国家的灵魂和纽带，苏共垮台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国家解体。

戴隆斌论文《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详细地论述了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发展、特点，探讨了特权阶层的存在严重地影响执政党建设，最终导致其失败。苏联特权阶层的特点包括：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权力具有专断性、权力的特殊性、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干部队伍的保守性等。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苏联干部制度中的“职务名册”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权阶层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张盛发论文《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的戈尔巴乔夫》（载李永全主编：《俄罗斯发展报告（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以丰富的资料叙述了苏联解体20年后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关于戈尔巴乔夫是历史伟人还是罪人的争论在俄罗斯国内外已经进行了整整20年。2011年，当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与苏联解体20年日子相遇的时候，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这位进入耄耋之年的历史老人再次展开了热评。结果表明，对戈尔巴乔夫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依然是众说纷纭和见仁见智。俄罗斯对戈尔巴乔夫评价分歧的原因主要与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在如何评判苏联历史问题上所现出的困惑和分歧有关。西方对戈尔巴乔夫评价分歧的原因则更多地与它们本身多元化的观念、对俄罗斯民主进程以及俄罗斯当今发展等问题的不同看法有关。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甘寂寞，通过采访和演讲等，对当年的改革再次进行了回顾与评价，对当今俄罗斯和国际时局发表了直率甚至尖锐的评论。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与评论清楚地反映了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历史》（«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杂志在2012年第3期上组织了学者题为《比较视野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的现代化》的笔谈圆桌会议。发表的论文有：黄立菲的《系统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中国与苏联比较研究》；张广翔的《中俄早期工业化道路的前提与机制》；余伟民的《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左凤荣、吕瑞林的《中国与苏联向现代化转型的成败得失》；王跃生的《非正式制度与俄罗斯经济转轨》；侯艾君的《中亚现代化的若干问题与思考：以吉尔吉斯为例》；许金秋的《中国大跃进与苏维埃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比较分析）》。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俄罗斯史学杂志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发表一组文章。

（责任编辑 靳会新）